

脑文本理论视域下的改写创作研究

A Study of Adap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rain Text Theory

陈红薇 (Chen Hongwei) 杨洪霖 (Yang Honglin)

内容摘要: 改写是一种古老的创作方法,但改写是怎样发生的,它产生的机制是什么,却是一个理论性难题。改写理论认为,改写是以一个或多个前文本为起源文本而进行的新的话语构建和再创作;但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域之下,改写和所有创作一样,其本质和核心是脑文本,是一种围绕改写性脑文本的创造而进行的活动,包括改写者从起源文本提取二次脑文本、生成改写性脑文本、书写改写性脑文本等三个阶段。从脑文本理论的角度研究改写,不仅揭示了改写创作的脑文本本质,也揭示了改写者脑文本实践的发生机制,从而为改写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方法。

关键词: 改写;起源文本;脑文本;脑概念;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 陈红薇,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外戏剧、改写、科技伦理研究;杨洪霖,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戏剧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戏剧中的神话重述与共同体研究”【项目批号:20AWW00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 Study of Adap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rain Text Theory

Abstract: As a time-honored writing form of literary creation, adaptation has long challenged critics in theory for how to account for its way of processing and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adaptation theory, adaptation is a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and recreation of texts by referring to one or more pre-texts as its fountainhead. Yet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mation of brain texts is the core of adaptation creation, which falls into three stages in processing: adapter's obtaining of the second brain text from the source texts, forming of the adaptative brain text, and transferring the brain text into written form of the work. Studying adap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in text theory,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not only reveals the essence of brain text creation in rewriting, but also explains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adaptor's brain text practice, thus opening up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iterary adaptation.

Keywords: adaptation; source text; brain text; brain concept;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s: **Chen Hongwei**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She is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drama, adaptation, and scientific ethics (Email: chenhongwei@ustb.edu.cn). **Yang Honglin** is a Ph. 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She is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British drama and scientific ethics (Email: yhl3004@163.com).

改写 (adaptation) 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无文字时代的口述故事和神话故事。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 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 改写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层出不穷, 形成了一个改写的盛世。与此同时, 一批改写理论家, 如丹尼尔·费什林 (Daniel Fischlin)、朱莉·桑德斯 (Julie Sanders)、玛格丽特·简·基德尼 (Margaret Jane Kidnie)、琳达·哈钦 (Linda Hutcheon) 等, 依托后现代理论 (postmodernism)、互文性理论 (intertextuality)、叙事学理论 (narratology), 对改写作品的意义、改写与前文本的关系、改写模式、主题驱动、艺术策略、改写背后的文化思潮等问题展开研究, 由此形成了一个后现代视域下的改写理论体系。但对于改写的根本性问题, 即改写创作的本质和发生机制, 改写理论并未做出真正的回答。

就改写的本质和发生而言, 改写理论家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语言、符号与文本间关系的叙事层面上, 认为“改写是改写者在新的文化、政治和语言背景下对前文本的再创作” (Kidnie 5)¹。用哈钦的话说, 改写是“一种先前书写虽已被拭去却仍隐约可现的多重文本的叠刻式书写” (Hutcheon 6-8), 一种“后”理论文化语境下的具有独立美学的再写性文学。但文学伦理学批评则认为, 文学书写并非是文学创作, 而是创作的表达, 文学创作是脑文本的创作, 因此改写文学创作的核心是改写性脑文本的生成。根据聂珍钊的观点, 脑文本是存储在人大脑中的文本, 是其他文本出现之前的第一形态和深层存在。²一切创作无不是脑文本的创造, 无论口头文学还是书写文学, 其源头都是保存在作家大脑中的脑文本。³所以, 没有脑文本, 就不会产生书面文学, 当然也不会有改写文学。

在脑文本理论视域下, 改写创作呈现为三阶段的创作过程: 改写者对起源作品的二次性脑文本的提取和储存、改写性脑文本的生成、改写性脑文本的书写。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理论引入改写研究之中, 不仅揭示了改写

1 本文外文引文均为笔者所译。

2 参见 张连桥: “文学伦理学批评: 脑文本的定义、形态与价值——聂珍钊访谈录”,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2019): 88。

3 参见 张连桥: “文学伦理学批评: 脑文本的定义、形态与价值——聂珍钊访谈录”,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2019): 88。

创作的脑文本本质，也揭示了改写性脑文本实践的发生机制，为改写创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一、改写者的阅读：二次脑文本的提取和储存

虽然从广义上讲，每个作品都带有其它作品的DNA，一切写作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改写性，但改写与普通创作的不同在于，改写明确建立在一个或多个起源文本之上，是从起源文本衍生而出的具有独立美学的新文本。所以，改写创作的起点是改写者对起源文本的阅读，但这种阅读在本质上不是单纯的阅读，而是改写者在大脑中通过阅读对原作品进行的二次脑文本的提取和记忆储存。我们之所以称它为二次脑文本，是因为改写者在阅读过程中所提取到的并非是原作者本人的脑文本，也非是原作品本身，而是改写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选择而获取的关于原作品的二次脑文本。它的价值在于是改写者创作新文本的起点和基础。所以，就改写创作而言，改写者首先是前文本的读者和起源脑文本的摄取者，然后才是改写文本的创造者。

在后现代改写理论中，改写的问题也是阅读和写作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写作是一种对话式的阅读，这种写作概念使得所有写作均具有改写性——因为在后现代性理论中，写作和阅读既是对先前文本的互文性引用，也是新意义的创造。正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所说，一个文本的阅读和意义的发生是通过激活其他文化的话语空间代码而得以实现的。¹但问题是，对于阅读如何激活其他文化的话语空间代码这一问题，无论写作理论还是改写理论均没有给出明确解释，而脑文本理论的意义在于为揭示阅读与改写的关系提出新的理论支撑。

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脑文本的角度为文学创作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视角。用聂珍钊的话说，“文学创作是作家根据伦理选择在大脑中脑文本和脑概念进行组合及编辑，由此形成新的文学脑文本的过程”（聂珍钊 王永 167）。这种对文学脑文本的理解无疑适用于所有文学创作，但改写性脑文本不同于其他文学文本：改写之所以是改写而非普通创作，是因为它在起源上根植于某个或多个前文本之上，也就是说，改写创作的起点是改写者对前文本的阅读和由此形成的脑概念。如《布雷伯夫的幽灵》（*Brébeuf's Ghost*, 2000）是印第安剧作家摩西（Daniel David Moses）对莎剧《麦克白》的改写。摩西明确指出，在创作之前读过《麦克白》并“从中获得了《布雷伯夫的幽灵》的核心框架”（McHugh）。他将莎剧幽灵叙事引入到了北美印第安历史和仪式文化之中，构建了一部基于莎剧结构的印第安史诗叙述。事实上，对戏剧改写者而言，“阅读”有时是以观剧的形式进行。加拿大黑人女剧作家西尔斯（Djanet Sears）曾以《奥赛罗》为起源文本创作了当代经典《哈莱姆二重奏》

1 See Slethaug, Gordon E., *Adaptations Theory and Criti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23.

(*Harlem Duet*, 1997), 该剧讲述了身为大学教授的奥赛罗为了融入白人社会, 抛弃黑人发妻、移情白人女性的故事。谈到这部作品时, 西尔斯指出它的起点来自莎剧: “我仍记得十一岁看电视剧《奥赛罗》时的感觉, 记得奥利弗·劳伦斯饰演的那张黑人的脸(……)它从此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并最终成为了《哈莱姆二重奏》创作的种子”(Sears)。与此相似, 战后英国剧作家威斯克谈到他的改作品《夏洛克》(*Shylock*, 1976)时也说, 其源头是观看《威尼斯商人》的经历: “1974年, 通过剧中莎士比亚人物的几句话, 我开始构思在脑中盘桓了近二十年的一个剧作(即《夏洛克》)”(vi)。总之, 从摩西到威斯克, 这些剧作家们谈到他们改写创作的起点时, 无不是追溯到某一部莎剧的阅读或观剧记忆。在这里, 记忆不是脑文本, 但它却是在大脑中存储和提取脑文本的方式。

我们传统上认为, 改写者对前文本的阅读是对作品的感知和理解, 但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提出, 这种从感知到理解的阅读经历是改写者对原作品脑文本的提取和储存过程。从认知的角度来说, “阅读过程中眼睛本身只能感觉到书写符号但不能理解它们, 作品要借助视觉神经传送至大脑进行处理, 才能实现对书写符号的认知和理解, 进而将理解的结果作为脑文本存储在大脑中”(张连桥 91)。所以, 所谓阅读, 是把所阅读的书写文本转换成脑文本或脑概念并存储在大脑中的过程。阅读过程中所提取到的并非是原作者本人的脑文本, 而是改写者在阅读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原作的二次脑文本, 即改写者在阅读中大脑所形成的对该作品的脑印象, 因此带有强烈的阐释性、评判性和再发掘性。比如, 威斯克在观看莎剧《威尼斯商人》时所获取的脑文本绝非是莎士比亚的脑文本, 因为我们无从知道莎士比亚创作该剧时的思想, 它也不是该莎剧的书写文本, 因为书写文本在本质上不过是莎士比亚脑文本的文字载体, 而非故事本身。观剧时, 威斯克身为战后犹太剧作家, 在后大屠杀历史语境下面对《威尼斯商人》时大脑中形成了二次脑文本——一个在威斯克脑中形成的带有反犹情绪的莎剧故事。他曾这样描述脑中的莎剧印象: “我并非是说莎士比亚的原意是反犹的(……)但该剧所产生的效果却是反犹性的(……)剧中那些为夏洛克辩护的词句(……)非但没能为夏洛克辩护, 反而强化了反犹主义的情绪”(Wesker xv)。舞台上的夏洛克受尽羞辱, 被夺去财产、尊严和宗教信仰, 并被当作一个无赖赶出了法庭, 因此台下的威斯克感到莎剧中有一种不可救药的反犹太性。同样, 西尔斯从《奥赛罗》中所获取的也不是莎士比亚的原初意向, 而是身为当代北美女性黑人剧作家, 其大脑中形成了关于《奥赛罗》的二次脑文本, 即一个西尔斯版的充满族裔政治的莎剧脑文本——在这个脑文本中, “《奥赛罗》并不是奥赛罗的故事。虽然他是西方戏剧史上的第一位黑人主角, 是该剧的主人公, 但他却不是故事的中心, 故事的中心是伊阿古和苔斯德蒙娜”(Sears)。在西尔斯的二次脑文本中, 《奥赛罗》的故事携带着一个沉重的当代种族问题

的伦理困惑，那就是“为什么加拿大的舞台上从来就没有非裔美洲人的声音？”（Sears）

这种二次脑文本的价值在于，它是改写者在阅读过程中对起源文本意义的伦理再选择。具体而言，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改写者会把阅读过的文本转换成脑文本并存储在大脑中，这就需要对脑文本进行选择。所以，阅读过程是一个涉及伦理价值思考、判断和选择的过程，即阅读是一种“阅读的伦理”（何卫华 聂珍钊 9）。就改写创作而言，“阅读的伦理”指的不仅是改写者在选择一部经典为其创作的起源文本时所展现出的伦理考量，更是改写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伦理选择会决定他对作品的二次脑文本的提取结果。比如，当西尔斯谈到起源文本《奥赛罗》时曾说：“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该如何从我的角度来看《奥赛罗》？我该如何评判奥赛罗？如果他活到今天，他将会是怎样的一个人？”（Sears）这段话显示出她大脑中的奥赛罗是一个当代伦理视域下的二次脑故事：在西尔斯的大脑中，她关注的是身为黑人将军的奥赛罗在选择苔斯德蒙娜这位白人妻子时的伦理环境，以及杀死她时的伦理困境。这位非裔加拿大女作家的当代伦理观使其二次脑文本中的奥赛罗成为了一个不同于莎剧的人物。

这种“阅读的伦理”不仅使改写者透过自己的伦理环境发现了一个不同于起源文本的二次性的“脑故事”，也使改写者在提取二次脑文本时将关注点聚焦于原文本中的留白和沉默地带，从而发现前文本中被覆盖和遮蔽的未言之意。由于语言和文字规则的制约，所有作家在把脑文本转换成书写文本时，并不能够把脑文本完整地书写下来，这就为我们在作家书写的文本基础上分析脑文本留下了空间。¹这种作品中的留白和沉默地带对改写者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使改写者对二次脑文本的提取成为一种对于起源文本潜在意识的再发掘——通过这些发掘，他们会看到一些被原文本遮蔽的潜意识，一些被原作者时代和社会历史隐藏或忽略的真相。在很多情况下，改写者正是以前文本阅读中发现的留白和沉默地带为切入点开始他们的改写创作。莎剧改作品《李尔的女儿们》（*Lear's Daughters*, 1987）就是这种二次脑文本创作的典型案例。该剧由范思坦（Elaine Feinstein）和“英国女性戏剧组”（Women's Theatre Group）集体创作而成，它以《李尔王》为起源文本，以“前写本”（prequel）的形式，从女性政治的角度创作了一个关于李尔女儿们的“她者”的故事。因此，该剧的创作集体在改写莎剧时关注的不是李尔，而是让历代观众感到困惑的三个女儿和她们“不在场”的母亲。因此，改写者从莎剧中的“留白”入手，提取到的是一个带有伦理追问的二次脑文本——为什么李尔的女儿们会如此残酷地对待父亲？她们的母亲又在哪里？在三个女儿的行为和母亲的沉默中是否存在着某种待发掘的真相？这种伦理追问导致我们发现了一个

1 参见 聂珍钊、王永：“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脑文本：聂珍钊与王永的学术对话”，《外国文学》4（2019）：172。

隐藏在莎剧故事中的关于李尔女儿们的二次脑文本，而这个脑文本则成为了改写创作的起点内核。

二、改写创作：改写性脑文本的生成

聂珍钊指出：“就书写文学作品而言，脑文本不是中间环节而是书写对象，也不是脑文本经过书写转变成文学书籍后才算完成文学创作。实际上，文学脑文本一旦产生，文学创作也就完成”（聂珍钊 王永 167）。所以，文学创作的本质是脑文本的创作，改写创作也不例外，但改写的独特处在于，它是对基于原作二次脑文本的再写性脑文本的创作。如果说改写者在阅读中获得的关于起源作品的二次脑文本为改写创作提供了素材和主题驱动，那么改写创作的发生则是指改写性脑文本的生成，即改写者围绕二次脑文本，加上他本人对世界的认知和思考，在大脑中对各种脑概念进行再编码，由此形成的崭新的脑文本。

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理论的重要贡献就是从脑文本的角度提出一种全新的创作理论。传统上，我们一直将作家的文学书写视为创作本身，但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提出，“文学创作指的是脑文本的创作，而非文学书写”（张连桥 92）。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文学作品的产生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作家创作文学文本，它产生的是文学脑文本；另一种是作家书写文学文本，它产生的是书面文本。所以，真正的文学创作是在大脑中发生的，是对脑文本及脑概念编辑的过程。作家以脑文本和脑概念为材料，按照文学的伦理规则对保存在大脑中的脑文本和脑概念进行多重组合，编辑加工为新的文学脑文本，这就是文学创作。¹ 所以，文学创作的核心是“脑文本”，文学创作是脑文本生成的过程。脑文本是保存在大脑中的思想，是由脑概念组成的，人类运用脑概念进行思维即能实时得到新的思想，脑概念组合的完成，即意味着思维过程的结束，思维的结果即是脑文本的产生。² 总之，脑文本类似计算机的应用程序，它既是人的思想，也是主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指令。就文学创作而言，经作者大脑思维而形成的脑文本被储存于其大脑中，成为带有意图驱动的先验文学，是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既定程序。³

脑文本理论对揭示改写创作的发生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所有文学创作一样，改写创作也是通过思想记忆而创造的脑文本，但改写创作与普通创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改写性脑文本的生产是以获取起源作品的二次脑文本为起点，通过互文性和“叠刻性”（palimpsestuous）思维，推动各种脑概念围绕二次

1 参见 张连桥：“文学伦理学批评：脑文本的定义、形态与价值——聂珍钊访谈录”，《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19）：163。

2 参见 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26。

3 参见 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27。

脑文本不断绽现，与其它意义交错、汇合、流动和运转，从而在与前文本的重复和共鸣中演绎差异和不同，最终生成改写性文学脑文本。无论费什林的“再语境”，还是哈钦的“叠刻性”创作，无不是发生在改写者脑中以二次脑文本为中心而进行的思想碰撞——各种脑概念在碰撞中杂错、互文、变形和编辑，形成改写性脑文本。

聂珍钊指出：“当我们有了一些脑概念并获得了一些脑文本以后，我们会为达到某个目的而对它们进行增补、修改、融合、编辑，并最终得到一个新的脑文本”（张连桥 28）。作为战后英国戏剧的主流作家，有着犹太身份的威斯克在创作《夏洛克》时，将积满厚重文化记忆的《威尼斯商人》二次脑文本置于“后大屠杀”的历史坐标系中，重新思考被给予了复杂社会印记的夏洛克文化现象和话语符号。¹从 1973 年观看《威尼斯商人》到写作《夏洛克》，威斯克的创作经历实际上是一个改写脑文本的构建过程。如他所说，1974 年他借用莎剧人物的几句话开始“构思一个在脑中盘桓了近二十年的剧作”。他所说的“构思”无疑是指在脑中“盘桓”浮现的一系列脑文本和脑概念，它包括：一、他在观剧中提取的对原莎剧的二次脑文本记忆，如三只匣子、一磅肉、杰西卡的私奔等。二、他在访谈中一再提及的奥斯维辛大屠杀和它与莎剧的内在关联性。用他的话说，“在夏洛克作为一个犹太人和令人厌恶的个体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界线。这是一种可怕的混淆！（……）因为它埋下了大屠杀的种子”（Wesker vi）。大屠杀的记忆已成为夏洛克文化符号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威斯克改写创作中最重要的脑概念。三、关于犹太人历史的文本记忆：在创作之前，威斯克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如罗斯（Cecil Roth）的《文艺复兴中的犹太人》（*The Jews in the Renaissance*, 1977）、《威尼斯犹太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Jews of Venice*, 1975）以及钱伯斯的《威尼斯的帝国时代，1380-1580》（*The Imperial Age of Venice, 1380-1580*, 1970）等，尤其重要的是威斯克对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合同法律条款研究后的发现。在当时的威尼斯，犹太人虽然从事借贷生意，但很多人只是将借贷视为业余职业，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读书和研究。这些文献查阅使威斯克获得了一个核心脑概念，即：1563 年的威尼斯不仅是基督世界文艺复兴的高峰，也是犹太文化最鲜活的时期，但在历史上，这一犹太文明的史实却被反犹事件所覆盖和遮蔽。在威斯克看来，“通过文献的阅读，他找到了一种新的戏剧结构和语言，并循着这种语言，挖掘到了一种新的创作源泉”（Wesker and Skloot 42），因此他决定创作一部新剧来重新讲述夏洛克和“契约”的故事。正是在这些复杂的多层次脑概念合力作用之下，威斯克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后大屠杀时代的夏洛克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夏洛克的形象不可避免地承受着奥斯维辛血腥记忆的洗礼，呈现出文化记忆的政治性和民族政治的人文性——这便是威斯克关于夏洛克的一个崭新的改写性脑文本。其中，夏洛克不再是莎剧中那个喊着“难道犹太人不会流血吗？”的原型形象，

1 参见陈红薇：《战后英国戏剧中的莎士比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56。

而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文主义者，一个其悲剧中埋藏着 20 世纪大屠杀因子的理想主义者。¹

和改写者的前期阅读一样，脑文本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伦理选择的过程。如果前者是“阅读的伦理”，那么后者就是“创作的伦理”。改写的过程是改写者和文本人物因伦理身份的位移而进行不同伦理选择的过程，这在诸如《哈莱姆二重奏》等的族裔改写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追根究底，“族裔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构成，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是族裔文学的核心问题”（何卫华 聂珍钊 10）。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在所有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都存在一条或数条“伦理线”（ethical line）以及一个或数个“伦理结”（ethical knot/complex）（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20-21）。在《奥赛罗》中，它的伦理结便是身为摩尔人的黑人将军奥赛罗娶了白人贵族苔丝狄蒙娜。在种族意识强烈的威尼斯人眼里，黑人不应该与白人享有同等的地位，他们的结合是一种伦理的混乱（ethical confusion），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奥赛罗自认无罪，却不能阻挡他的贵族岳父召集亲属问罪于他的原因。

西尔斯构思改写性脑文本的过程是一个围绕奥赛罗而展开的族裔伦理的再思考，即西尔斯让其笔下的奥赛罗根据当代社会价值对族裔伦理的重新选择。事实上，西尔斯萌生改写《奥赛罗》的想法本身就缘起于两个族裔伦理的追问：为什么加拿大的舞台上从来没有非裔美洲人的声音？为什么《奥赛罗》却不是奥赛罗的故事？西尔斯在这两个问题中看到了一种内在的伦理关联性，就像威斯克在夏洛克和大屠杀之间看到了伦理关联性一样。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要想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事以及人的行为、思想和伦理选择的过程，就要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伦理环境中去考察研究”（王金娥 7）。在构思改写性脑文本时，西尔斯将奥赛罗置于新的历史伦理环境之中——19 世纪的南北战争、1928 年的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通过这三个对黑人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坐标点，西尔斯为奥赛罗构建了多重的当代伦理环境，赋予了奥赛罗新的伦理身份，将其置于新的伦理选择事件中。“伦理身份对于伦理选择至关重要，它是伦理选择的前提，伦理身份的变化会直接引发伦理混乱”（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21）。在西尔斯的脑文本中，奥赛罗面对黑人妻子和白人社会的选择构成伦理事件，或曰伦理结。在这一伦理结中，一方面是奥赛罗对族裔伦理和黑人道德的背叛所引发的伦理混乱——作为当代无数黑人的化身，奥赛罗所背弃的不仅仅是他的黑人发妻，更是自己的黑人身份和黑人精神²；另一方面，奥赛罗的伦理选择又是一个当代黑人知识分子立足黑人历史

1 参见陈红薇：《战后英国戏剧中的莎士比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65。

2 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看，黑人精神（negritude）是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的继续和发展，是非洲黑人做出的争取种族精神独立的伦理选择。它不仅是在殖民主义背景下出现的文化运动，更是建立非洲黑人新伦理的思想运动。参见 聂珍钊：“黑人精神（Negritude）：非洲文学的伦理”，《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18）：51-58。

和当代社会，对族裔伦理秩序的自我重构。所以，西尔斯在思考如何改写奥赛罗的故事的过程，正是通过主人公新的伦理环境和伦理选择，构建了一条基于其本人伦理思考和当代黑人伦理困惑的多维度的伦理情节，以此形成了她的莎剧改写性脑文本。

三、改写作品：脑文本的符号表征和文本转换

虽然改写创作发生在脑文本阶段，但脑文本本身无法实现文学创作。因为脑文本是以人的大脑记忆存在的生物形态，只有被转化为语言符号，才能成为可视、可阅的书写文本，实现向读者传达意义、完成教诲的目的。改写文学的创作也不例外。改写者的脑文本也只有通过书写的符号表征才能向读者传递改写者的思想意图，但即便在改写脑文本的文本化阶段，改写文学也与其他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改写是对前文本的再写，前文本不仅以二次脑文本的形式在改写脑文本的形成阶段发挥核心作用，也以素材的形式在改写脑文本的叙事表征中发挥形塑功能。

虽然文学书写不是文学创作本身，但它却是作家的脑文本得以物化、其伦理价值得以实现的载体。换言之，无论脑文本中存储着多少思想，脑文本本身不是语言，而只是保存在大脑中的生物性文本或记忆性文本，因此它具有独特的“私有性”（private property），既看不见，也无法与人共享。要想让读者了解、接受和保存作者大脑中的脑文本，就需要借助书写符号表达出来，使之成为可视性文本，即书写文本。¹ 所以，“书写文本的价值不在于满足作者本人理解脑文本的需要，而在于借助语言将脑文本物化为可以传输的信息文本，让自我之外的人通过阅读来理解和提取脑文本”（聂珍钊，“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 120）。

“文学书写是一种脑文本的文本转换，指把作者脑中抽象的脑概念转换成由符号构成的具体的文本故事”（聂珍钊，“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 120）。在所有文学创作中，虽然“语言故事是由脑文本预先确定的”（聂珍钊，“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 120），但从脑文本到书写文本的叙事却是由作者的艺术策略所决定。在改写实践中，改写的性质决定了不论改写在艺术风格上有何不同，所有改写在将改写性脑文本转化为书写文本时都表现出一种共通性：他们的改写叙事无不是在创造性地“挪用+误用”前文本记忆，对前文本的人物、情节、话语加以变形、修正和创造，从而唤起读者的某些文本记忆，最终引导他们形成并接受改写者为他们预先构建的脑文本。正如马洛维奇所论，改写作品的改写性本身“要求观众对原作有一定的前期认知，因为只有当我们了解莎剧的连续性，才能体验改写带来的非连续性——通过重访人们熟知的但被陌生化的记忆（包括人物、情节、主题），

1 参见 聂珍钊：“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19）：115。

在观众中实现改写者的真实意指”（Rozett 85）。马洛维奇说道：“是不是所有人，包括那些没读过《哈姆雷特》的人，都知道这部戏剧？或者说，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是否已沉淀有哈姆雷特的印迹，从而使我们对他怀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Scott 105）他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中沉淀的哈姆雷特的记忆，指的正是读者脑中存在的关于哈姆雷特的脑概念或脑文本。

改写者在进行创作时，正是按照其改写性脑文本的提前预设，通过激发读者脑中先前存在的脑概念和脑文本，从而达到改写的意图。关于改写叙事，理论家曾使用不同的理论术语来描述它，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dialogue theory）、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热奈特的“跨文性”（trans-textuality）、布鲁姆的“修正论”（revision）、费什林和福杰的“再语境”（recontextualization）、桑德斯的“移植”（grafting）以及哈钦的“叠刻性”重写等等。虽然这些批评家们在讨论改写时使用的术语不同，但他们表达的意思却是相似的，即改写脑文本的书写和改写脑文本的生成一样，都依赖于对起源文本的互文和叠刻，其不同仅在于，一种是思维叠刻，另一种是语言叠刻。改写创作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的内在叠刻性¹，这种叠刻性贯穿于改写实践的全过程，不仅存在于改写作家脑文本的形成阶段、书写表征阶段，也存在于读者和观众对改作品的接受阶段。因此，所谓改写就是改写者通过不同阶段的脑文本，在与其他作品记忆的重复和共鸣中，演绎意义上的差异，实现思想上的传递。

改写研究者卡勒主张，一个文本意义的发生是通过激活其他文化的话语空间代码才得以实现的。²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改写的书写和叙事问题。由于改写是改写者有意识地“挪用”（appropriate）³其他文本记忆，并有目标性地消费读者脑中先在的文本记忆来传达其伦理意图，所以改写性脑文本的书写关键在于，改写者如何“挪用”前文本以有效引导读者获取改写者期待读者加以接受的脑文本或脑概念。比如，1976-1977年，西方舞台上先后出现了两部《威尼斯商人》改写剧作：一部是威斯克的《夏洛克》，另一个就是马洛维奇的《〈威尼斯商人〉的变奏》（*Variations o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1977）。威斯克和马洛维奇均是犹太剧作家，他们对《威尼斯商人》二次脑文本的提取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均不约而同地将该剧放在大屠杀时代的政治语境中，从莎剧与犹太政治的伦理关切上解读该剧，但“由于他们改写的意图不同，他们采用了迥然不同的路径来实现其书写表达”（陈红薇 94）。

从改写性脑文本的意图来讲，“威斯克力图从‘后大屠杀’动态历史的

1 See Hutcheon, Linda, *A Theory of Adapt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06, 7.

2 See Slethaug, Gordon E., *Adaptations Theory and Criti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23.

3 朱莉·桑德斯曾写过《改写与挪用》一书。See Sanders, Julie, *Adaptations and Appropri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视角，拷问由西方主流文化沉积而成的夏洛克形象和由此而折射出的政治意识”（Rozett 44），而马洛维奇则是旨在彻底“改变莎剧的道德指向”——只要安东尼奥仍旧是“一个好人”，夏洛克就不得不是个无赖。¹从脑文本到改写书写，威斯克凸显的是萦绕在夏洛克这一文化现象之上的政治趋向和意识形态的内涵，而马洛维奇更多的是把夏洛克的故事变成一个当代犹太人的故事。鉴于改写性脑文本的走向不同，两位改写者将改写意图文本化的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叙事手法。威斯克选择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历史叙事，将夏洛克的故事再语境到16世纪威尼斯的犹太居住区，来重构夏洛克的故事。16世纪在欧洲历史上以文艺复兴著称，但对于犹太民族来说它却是一段犹太文明的迫害史。在威斯克的改写文本中，夏洛克不是一个生活在威尼斯的外来者，而是一个被禁锢在集中营一般犹太社区中的一个人文学者、一个视知识为生命的犹太藏书家。为表达其改写脑文本，威斯克重写法庭一场，重写“一磅肉”的契约故事，从而“揭示夏洛克的悲剧中隐藏的20世纪大屠杀的种子”（陈红薇 72）。

相比之下，马洛维奇在书写其改写脑文本时则采用了比威斯克更加复杂的改写策略。首先，马洛维奇不仅留下了莎剧中一磅肉和法庭审判这一核心情节，还留下了求婚、三个匣子的另一条主线；其次，马洛维奇采用了再语境的叙事策略，将莎剧移植到现代耶路撒冷的历史背景之中²，以期引导观众在观看此剧时将“后 1946 年”事件纳入对该剧意义的阐释中。马洛维奇在改写性的书写中采用了后现代拼贴（collage）叙事，将莎剧与《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 1589）糅合在一起，使他们形成互文和对话，不仅推动了故事叙述，也“暗示了两部经典所暗含的反犹传统和与当今政治现实的渊源”（陈红薇 96）。

综上所述，从脑文本理论的视角研究文学改写，不仅可以揭示改写创作是脑文本的创作这一本质，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改写性脑文本的发生机制，从而为改写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在脑文本理论的关照下，我们可以看到改写创作的清晰的运作机制，尤其前文本中的文化话语代码和语言文化符号在改写创造活动中被激活并得以改写和转换。因此，脑文本理论视域下的改写创作研究将进一步推动对文学改写这一当代文艺理论的重要论题的深入理解和创新阐释。文学伦理学批评脑文本视域下的改写机制探索必将为新时代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做出新贡献。

Works Cited

陈红薇：《战后英国戏剧中的莎士比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

1 See Marowitz, Charles, *The Marowitz Shakespeare*, New York: Drama Book Specialists, 1978, 22.

2 此时英国托管统治已经结束，并将巴勒斯坦交给了犹太人。

- [Chen Hongwei. *Shakespeare's Presence in the Post-War English Drama*. Beijing: Peking UP, 2019.]
- 何卫华、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族裔文学: 聂珍钊教授访谈录”, 《外国语文研究》1 (2020): 1-12。
- [He Weihua and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thnic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ie Zhenzhao.”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1 (2020):1-12.]
- Hutcheon, Linda. *A Theory of Adapt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06.
- Kidnie, Margaret Jane. *Shakespeare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Marowitz, Charles. *The Marowitz Shakespeare*. New York: Drama Book Specialists, 1978.
- McHugh, Marissa. The Influence of Shakespeare on Aboriginal Theatre: An Interview with Daniel David Moses on Brébeuf's Ghost. Canadian Shakespeares. 5 November 2003. 26 July 2016 <http://www.canadianshakespeares.ca/i_ddmoses.cfm>.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 “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6 (2019): 115-121。
- [—.“On Brain Text and Language Generating.”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 (2019): 115-121.]
- :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外国文学研究》5 (2017): 26-33。
-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and Brai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7): 26-33.]
- 聂珍钊、王永: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脑文本: 聂珍钊与王永的学术对话”, 《外国文学》4 (2019): 166-175。
- [Nie Zhenzhao and Wang Yo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Brain Text: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Nie Zhenzhao and Wang Yong.”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9): 166-175.]
- Rozett, Martha Tuck. *Talking Back to Shakespeare*. Newark: Delaware UP, 1994.
- Sanders, Julie. *Adaptations and Appropri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 Scott, Michael. *Shakespeare and the Modern Dramatist*. New York: St. Martin's P, 1989.
- Sears, Djanet. An Interview with Djanet Sears. *Canadian Adaptations of Shakespeare Project*. 7 July 2004, 1 December 2012 <<http://www.Canadianshakespeares.ca>>.
- Slethaug, Gordon E. *Adaptations Theory and Criti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 王金娥: “跨学科视域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聂珍钊教授访谈录”, 《山东外语教学》1 (2018): 3-12。

[Wang Jin'e.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ie Zhenzhao."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1 (2018): 3-12.]

Wesker, Arnold. *The Birth of Shylock and the Death of Zero Mostel Diary of a Play 1973 to 1980*. London: Quartet Books, 1997.

Wesker, Arnold and Robert Skloot. "Interview: On Playwriting."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2.3 (1978): 38-47.

张连桥: "文学伦理学批评: 脑文本的定义、形态与价值——聂珍钊访谈录",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2019): 85-93。

[Zhang Lianqi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Definition, Form and Value of Brain Text: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ie Zhenzhao."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5 (2019): 85-93.]